

一部偽/續書的形成： 民國初年百新本 《老殘遊記》下編的製作*

許暉林

提 要

劉鶚的《老殘遊記》初編二十回於 1906 年在報刊上完整發表後，引起了極大的迴響。除了不同出版社相繼刊印初編單行本，同時也出現了多種續書。1916 年上海百新公司出版精校批注本的《老殘遊記》上下二編。該版本上編為劉鶚原著的初編，下編則是百新公司借劉鶚之名所續的續書。近年學者開始注意百新本對於《老殘遊記》在民國初年的傳播的重要性。本文的目的是藉由百新公司這一出版項目的個案研究，勾勒出民國初年商業出版與國族認同建構之間關係的一個側面。不同於過去相關研究以該書本身的序言以及內容為主要分析對象，本文將百新公司的宣傳及銷售廣告納入考察的重點。本文探討百新公司如何利用廣告宣傳和引入時事來打造小說的“預言書”的形象。百新公司在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製作和出版中不僅關注商業利益，更巧妙地將商業利益、政治表態、國族情感以及對神秘主題的渴望融合在一起。

關鍵詞：《老殘遊記》 百新公司 續書 廣告 預言

* 本人首先要感謝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University of Toronto) 東亞系馮相郡博士在本文寫作期間給予的寶貴建議和支持。此外，我也要感謝柏克萊大學東亞圖書館何劍葉博士協助授權本文使用初版百新本《老殘遊記》影像。最後，我要向兩位提供詳細修改建議的匿名審查人表示由衷感謝，他們的意見使本文更臻完善。

一、前 言

劉鶚（1857—1909）的《老殘遊記》可說是晚清最重要的小說之一。《老殘遊記》共有兩編。初編部分內容首先於 1903 年在《繡像小說》上發表，後來到了 1906 年以完整的二十回在天津《日日新聞》上重新刊載。初編二十回於 1906 年發表之後，其廣受歡迎的程度引發了大量的盜印，甚至開啟一波續作的風潮。¹ 二編 9 回於 1907 年同樣發表於天津《日日新聞》。相較於初編的大受歡迎，二編則可能因為連載未完或者其他原因而在刊出後沒有受到太多注意，甚至一度被認為是托名劉鶚的偽作。在目前可見《老殘遊記》的續書當中，以 1915 年 8 月由上海百新公司出版、傅幼圃批注的《老殘遊記》下編（以下簡稱爲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爲最早。² 百新本《老殘遊記》分爲上下二編。上編是劉鶚原著初編二十回《老殘遊記》，下編則是百新公司借劉鶚之名另外續寫的 21 至 40 回續書，兩編都由傅幼圃批注。正如學者指出的，百新本《老殘遊記》是民國初年流傳最廣、也最具影響力的《老殘遊記》版本。之所以能夠如

-
- 1 根據劉鶚四子劉大紳的觀察，“《老殘遊記》行銷既暢，坊間謀利者，竊印之不足，更從而仿作焉”。當時劉大紳所見續書，最早的是漢口出版的《續老殘遊記》、繼而有上海百新公司的《老殘遊記》上下二編，後來在天津見到兩種續書，上海又見到另一種。見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文苑》1939 年第 1 期，頁 18—19。劉大紳所見的出版於上海的《老殘遊記》續書，除了百新公司出版的《老殘遊記》下編之外，另一種可能是由楊塵因所著的《老殘新遊記》（於 1922 年始刊於《快活》雜誌，1924 年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單行本）。此外，另有仿作一種《慨生游志》刊於 1914 年 7 月至 9 月間瀋陽的《盛京時報》。見張永芳：《近代小說〈慨生游志〉係〈老殘遊記〉的仿作》，《清末小說から》第 96 期（2010 年 1 月），頁 18—20。
 - 2 本文所討論的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以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版本爲準。北京國圖百新本《老殘遊記上編》爲 1920 年代重印本，因使用甲種標點符號，題爲《甲種批注老殘遊記》。下編則爲民國 5 年百新公司初版（傅幼圃：《老殘遊記》下編。上海：百新書店，1916 年），以下簡稱《老殘遊記》下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下編書末廣告頁包括哀情小說《薄命花》的廣告：“是書昔年民權報所登載，苦未能窺其全豹，原稿爲本公司覓得，已現付印，不日出版。”而隔年（民國 6 年）《薄命花》就由百新公司出版。由此可以確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老殘遊記》下編的確是 1916 年 8 月出版的初版。若非特別說明版本，下文所引《老殘遊記》下編皆以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之百新本爲準。除了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之外，美國柏克萊大學東亞圖書館（The C.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藏有完整的民國 5 年 8 月初版的百新本《老殘遊記》上下兩編。

此,不僅是因為該版本的上編是根據原始的天津《日日新聞》初編二十回本進行精校詳批,同時也是因為百新公司依託劉鶚之名所續作的下編被成功地塑造為一部精準的“預言書”。³



1916年百新本《老殘遊記》上編版權頁



1916年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封面

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接續劉鶚《老殘遊記》初編第二十回情節往下寫。初編二十回中,老殘與好友德慧生巧遇、結伴回江南。老殘原本計劃攜剛娶的妾翠環與德慧生一家同回蘇州,卻於途中遇見好友祝清虛邀約遊泰山。老殘與清虛在遊泰山的過程中拜訪了斗姥宮等地,並且在山頂遇見得道僧人普惠及道人雲鶴子。老殘與二人縱論三教對於國家“氣數”的看法,並且聆聽普惠及道人雲鶴子對於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預言。下了泰山之後,老殘前往北京、山西遊歷,並在山西遇見友人管振華邀約擔任紡織工廠經理。

3 Xiangjun Feng. “The Travels of Lao Can as a Book of Prophec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3.1 (2023): pp. 211–213.

爲此,老殘前往日本考察並且購買機器,又於回程途中目睹當時已被日本佔領的朝鮮的慘狀。小說以老殘感嘆朝鮮亡於日本,爲此憂慮警惕作結。

關於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這一掀起民國初年《老殘遊記》風潮的關鍵文本,近年已有學者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分別來自神田一三(樽本照雄)以及馮相郡。兩位學者的研究涉及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幾個重要問題,包括作者、版本以及行銷手法等等。神田一三對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各種現存版本進行詳細的梳理,並且提出現有資料中關於作者身分的矛盾之處。馮相郡則透過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版權頁、序言、內容及評點的分析,討論百新公司如何將該書下編炮製爲出自劉鶚之手的政治預言書。⁴ 本文則採取了不同的角度來討論這部“預言書”的形成過程。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本身”的製作(包括作者、版本、序言、內容與評點)固然是我們檢視這部小說形成的重要依據,但是並非唯一的依據。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是民初上海競爭激烈的出版環境中的產物。將這部小說放回它的出版脈絡當中,有助於我們從動態的角度理解它的生產。

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生產並非始於小說本身的製作,而是始於小說開始製作之前的宣傳。百新公司於小說出版的兩年前,就在報紙上頻繁刊登各種行銷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廣告。這些廣告爲我們提供一個絕佳的機會,將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形成納入不斷變動的、因實際需求隨時調整的出版實踐過程當中考察。此外,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不只因其商業出版的性質牽涉到百新公司的商業利益,其作爲一部創作本身也涉及小說作者本人的寫作關懷。本文將藉由對現存史料、小說敘事、銷售廣告以及小說作者的其他著作的考察入手,挖掘作爲“預言書”的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出版過程所涉及的商業操作與政治議題,以勾勒民國初年政治認同與商業出版之間複雜關係的一個面向。

4 見 Xiangjun Feng. “*The Travels of Lao Can as a Book of Prophecy*,” pp. 203 – 228.

二、出版之前：關於作者、出版糾紛與出版日期

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出版涉及出版社上海百新公司與劉鶚家人之間的一場著作權糾紛。百新公司在出版《老殘遊記》上下二編之前，徑以劉鐵雲之名在報紙上大肆刊登上下二編的預售廣告。這一廣告引起劉鶚四子劉大紳（1887—1954）的注意。劉家與百新公司爲此展開協商。上述經過在劉大紳以及其子劉蕙孫的文章中都有記載，並且被目前《老殘遊記》續書研究廣泛引用。但是，劉大紳與劉蕙孫關於這一協商過程細節的敘述，本身存在著不一致。這也使得與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這一最早的《老殘遊記》續書出版相關的基本事實輪廓依然未能得到釐清。本節的目的即嘗試梳理劉家父子二人對於此一協商的描述，以及百新公司後續的出版措施，以爲目前尚在起步階段的《老殘遊記》續書研究提供必須的基礎事實考察。

劉大紳寫於 1936 年的《關於〈老殘遊記〉》一文是首次揭露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出版過程的文獻。根據劉大紳的描述，他在報紙上看見百新公司廣告要出版《老殘遊記》續書，因此前往訊問。隨後百新公司經理人徐鶴齡到劉府向劉大紳解釋、道歉，⁵說明“彼蓋不知真有二編”，並希望劉家能提供原稿，讓百新公司能夠徑行付印。劉大紳以必須取得家族同意爲由拒絕提供。後來負責該書的編輯傅幼圃請求劉大紳提供劉家所藏二編的“真本”供其參考以免行文唐突，劉大紳再次拒絕，但是同意告知劉鶚事蹟以供寫作參考。⁶ 劉大紳爲了確保小說不會有妨害劉鶚名譽的描寫，還要求書稿完成後必須給劉家過目。劉大紳於民國 15~16 年（1926 至 1927）在天津工作時讀到青島《新語副刊》中

5 據神田一三的說法，這裏的經理人指的就是百新公司老闆徐鶴齡。見神田一三：《劉家公認の贋作“老殘遊記”》，《清末小説から》第 137 期（2020 年 4 月），頁 12。

6 該段文字原文如下：“繼又來謂請膠州傅君主編，傅君爲近日名士，一再商量，傅君謂最好借原本一閱，庶行文不致唐突云云。紳答以此則不能，但先君生平大略，則不妨相告。其後此君第三次來，要求借用初原編印本校對，紳因當時竊印者訛誤過多，允之。”神田一三認爲，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劉大紳直接與傅幼圃會面並進行了談判。見神田一三：《劉家公認の贋作“老殘遊記”》，頁 14。

傅幼圃敘述“仿作”下編的經過，並向劉家致歉的文章。對於傅幼圃光明磊落的態度，劉大紳表達了感佩，指出“傅君所作，亦自有相當價值。紳兄弟于敬佩傅君光明磊落外，並甚願有權者再印該續編時，易入傅君真名。並將傅君聲敘之文附入，既免埋沒，且留此一段文字因緣，可為將來嘉話也”。⁷ 從劉大紳的描述看來，決定以劉鶚名義出版並且與劉家接觸的是百新的經理人，而傅幼圃則是出版商聘雇而來為續書執筆的作者。劉大紳不僅對百新公司沒有過於強烈的批評，並且對於該書的品質以及傅幼圃的磊落行徑有頗為正面的評價。

關於傅幼圃其人，過去研究很少觸及，僅在論及百新本《老殘遊記》時以小說批注者以及下編作者的身分順帶提到。即使有學者嘗試考察，也僅止於其部分著作，及其與百新公司的合作關係。⁸ 傅幼圃約生於 1854 年，卒年不詳。由傅幼圃著作署名“膠州”或“膠東”來看，傅幼圃籍貫為山東膠州。傅幼圃精於岐黃之術，先後遊歷北京與江浙。民國二年之際寓於上海。⁹ 由於資料的缺乏，傅幼圃早年寫作生涯的相關訊息難以得知。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 1914 年到 1926 年之間，也就是他 60 到 72 歲之間，他是一位相當活躍的作家。除了百新本《老殘遊記》之外，他在百新公司還出版了以中國近代受列強侵害歷史以及自救之道為主題的《中國血淚記》（1915 年出版，後於 1926 年增補文字後改為《中國痛史》），以及以情慾為主題的知識性書籍以及勸懲小說，包括《色慾寶鑑》（1914 年再版）、《色情之男女》（1914 年 4 版）、《色情之男女補編》（1914 年 3 版）、《風流皇帝》（1916）、《色迷》（1917）、《肉慾害》（1926）。¹⁰ 他於 1910

7 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頁 18—19。

8 神田一三所列傅幼圃的著作包括《色慾寶鑑》（1914）、《風流皇帝夢》（1916）、《中國痛史》（1927）、《色情之男女》（1931 三版）。見神田一三：《劉家公認の贗作“老殘遊記”》，頁 12。但實際出版著作則不止於此。

9 《色情男女之補編》中署名寶璐的民國三年（1914）跋當中提到傅幼圃“自幼喜讀奇書，於諸子之中，尤喜軒岐，故殫精竭慮，究心醫理者，四十餘年。始而奔走京師，繼而遊歷江浙。無如數奇，道終不行。年屆耳順，壯志未衰。去年南北交訌，滬上已成戰場。余兄日處槍林彈雨之中，閉戶著述，宴如也”。寶璐：《〈色情之男女補編〉跋》，《色情之男女補編》（上海：百新書店，1933 年）。如果傅幼圃於 1914 年之際年屆耳順，那麼生年可推斷大約是 1854 年。

10 關於《色慾寶鑑》《色情之男女》《色情之男女補編》的出版時間，見《看出版之預告：百新公司百新新話》，《時報》1914 年 11 月 30 日第 4 版廣告中已出版的書籍。

年代中期到 1920 年代初期之間，也在百新公司以外的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包括武俠小說以及愛國小說在內的多種類型書籍。¹¹ 可以說，傅幼圃的寫作主要圍繞在情慾、俠義以及愛國等主題，是一位在 1910 到 1920 年代以上海為寫作基地的多產作家。

然而，劉大紳的兒子劉蕙孫對傅幼圃在“作假”《老殘遊記》下編一事當中的角色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劉蕙孫在 1994 年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所理解的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出版經過。雖然劉蕙孫與父親劉大紳兩人對於劉家與百新交涉的經過的描述大致相同，但是其中卻有著細節上的差異。正如上述，劉大紳在 1939 年的文章上說，百新公司徐鶴齡是主其事者，而傅幼圃則是受其委託寫作下編的真正作者以及道歉文章的作者。但是，劉蕙孫卻說了一個不同的故事。劉蕙孫說，父親劉大紳告訴他，傅幼圃是決定“作假”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背後主謀，至於真正執筆者父親自己也不知。直到劉蕙孫自己在民國十五、十六年左右於天津讀到《青島新報》的副刊《新語》，看到陳蓮痕的道歉文章，才知道真正的執筆者是陳蓮痕。¹²

那麼，父子兩人，到底誰的說法才是對的呢？由於缺乏進一步的資料，學者傾向對這一問題持保留的態度。¹³ 不過，這並不妨礙我們透過間接證據來做一些初步的判斷。首先，我們可以從兩人所提到的報紙入手。民國十五、十六年左右以《新語》為名的報紙副刊，最有名的就是當時主政山東的奉系軍閥張宗昌（1881—1932）所主辦的《新魯日報》的副刊。張宗昌於 1926 年底辦了這份

11 傅幼圃在 1915 到 1921 年間，在上海德新書局、泰東書局、上海校經山房、上海文匯書局、江東茂記書局以及東陸圖書局出版了多種書籍。這些書籍包括了以小說形式所寫的，以列強侵害中國歷史為主軸的《天將明》（1915）、《繪圖愛國醒世小說國事真悲》（1917）、《八劍七俠十六義》（1918）、《新編俠女紅蝴蝶》（1918）、《繪圖繡像十七續彭公案》（1921）、《繪圖繡像十八續彭公案》（1921）；以北洋皖系軍閥徐樹錚“禍國始末”為主題的《徐樹錚演義》（1920）。

12 劉蕙孫：《〈老殘遊記〉出版九十週年》，《南京理工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1、2 期，頁 64—65。陳蓮痕原名陳燕方，蘇州鹿城人，為蘇州文人社團星社成員。據《中國現代文學辭典》，陳蓮痕曾經主持《新魯日報》《新魯月刊》編務，之後赴天津組織通訊社，繼而到上海為廣益書局撰寫長編小說《順治演義》《康熙演義》《董小宛演義》《乾隆休妻》《同治嫖院》，中篇小說《順治出家》，短篇小說集《京華春夢錄》等。見徐迺翔：《中國現代文學辭典（小說卷）》（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56。

13 神田一三：《劉家公認の贗作“老殘遊記”》，頁 14。

報紙，請蘇州文人社團星社主要成員范煙橋(1894—1967)赴濟南主持編務。根據鄭逸梅(1895—1992)的回憶，《新魯日報》日出兩大張，其副刊《新語》載長篇小說、劇談、影評、詩話、筆記、軼事、謎語等。¹⁴ 這與劉大紳對所見報紙的描述相當符合：“約在張宗昌督魯時出版……仿佛是畫報又仿佛是雜誌。”¹⁵ 《新魯日報》是張宗昌主政下所辦的報紙，而其兩大張的形式，也正與當時畫報的形式相仿。至於劉惠蓀所稱的《青島新報》則是性質全然不同的報紙。《青島新報》是德國於1905到1914年間在青島地區出版的德文報紙，當中並沒有中文的《新語》副刊。其次，劉大紳說法的根據是其年屆不惑時親身所歷，並且在這一事件發生之後的二十三年(1939)寫下並發表。而劉蕙孫在1994年提及該信息時，已經是85歲老人對近70年以前的事的回憶。劉蕙孫的說法有可能是年代久遠，記憶有所誤差所致。我們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劉蕙孫是將劉大紳文章中所述，誤記成自己經歷的可能性。畢竟，兩人讀到這一篇文章的地點同樣是天津，讀到的時間同樣都在民國十五、十六年，可能性並不高。當然，要判斷兩者說法的真確性，最好的證據就是兩人所說的青島報紙上的道歉文章。但是，遺憾的是，截至目前為止，筆者尚未能找到留存下來的任何《新魯日報》的資料，遑論副刊《新語》上的文章。就目前有限的資料來看，本文傾向以劉大紳的說法為準，即以傅幼圃為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作者。

在討論完了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作者之後，我想要進入另一個議題，那就是百新公司與劉家的出版糾紛協商。這場糾紛要從該書出版的兩年前開始說起。1914年11月30日開始，百新公司在《時報》上連續刊登了三天“百新公司百新新話”的廣告：

是書風行海內，無待贅述。惟書中缺漏尚多，本公司編輯部膠州傅幼圃君知之最詳。今將全書內容詳細修正，加以批注。現已付印，不日出

14 見鄭逸梅：《藝林舊事》(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6年)，頁200。

15 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頁19，注2。

版。……此書尚有後編，今本公司覓得原稿，仍請傅君修加批注，不日出版。¹⁶

這一則廣告當中，百新宣稱已經獲得《老殘遊記》後編的原稿，並且將請該公司編輯傅幼圃負責前後兩編的“修正”與批注。百新雖然承諾“不日出版”，但是廣告刊登之後兩年過去了，書卻沒有動靜。

直到 1916 年 5 月底，百新公司大手筆在《時報》《申報》及《新聞報》三大報紙上陸續發了多篇廣告。這一波廣告是以賣特價券的方式來促銷：

《老殘遊記》上下編特價券五千部。洪都百鍊生，江南著名士也。精於數理掌故之學，為山東巡撫張朗齋所推重，屢蒙徵聘，不就，而托跡於山川。實借遊歷以考察時政，深明世將變遷，故作是書，使人早知趨避。書分上下兩編，共計四十章。本公司覓得（下編）原稿於前年……現已付印，儘六月告竣。先售特價五千部以答來函諸君之雅意。¹⁷

百新在書出版之前以特價預約的方式來促銷，以及投入大量資金連續刊登廣告（在三家全國性報紙上刊登多則廣告，甚至買下《申報》的頭版廣告，可以想見廣告費之鉅），這些都符合徐鶴齡“預約售出已多，廣告費亦鉅，中止則賠累不堪”的告白。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這則廣告明確地以“洪都百鍊生”的名義來賣書。這為我們判斷劉大紳與百新公司接觸的時間點提供了明確的線索。我們知道，劉大紳在與徐鶴齡的交涉中，明確要求不得使用“洪都百鍊生”名義賣書。這說明了這一波廣告是刊登於劉大紳與徐鶴齡見面之前。劉大紳

16 《百新公司百新新話》，《時報》1914 年 11 月 30 日第 4 版，12 月 1 日第 4 版，12 月 2 日第 9 版。

17 《〈老殘遊記〉下編特價券五千部廣告》，《時報》1916 年 5 月 31 日第 1 版，6 月 1 日第 1 版，6 月 3 日第 1 版；《新聞報》1916 年 7 月 11 日第 13 版；《申報》1916 年 5 月 25 日第 1 版。

很可能就是看到了這波廣告而得知“洪都百鍊生”之名被用來推銷百新公司出版的下編,進而找上了百新公司質問。這一波使用“洪都百鍊生”之名的廣告最後一次刊登在1916年7月11日的《新聞報》。在這之後一直到百新本《老殘遊記》在8月出版,甚至是出版後的一年內,百新公司都沒有在廣告中使用“洪都百鍊生”的名義。這說明了,劉大紳與百新接觸很可能是在1916年7月11日之後。

從7月11日到廣告中預告新書出版的七月底,只有二十天的時間。這對百新公司來說顯然是一個很大的壓力。這不只是關於要不要用“洪都百鍊生”的名義的問題而已。根據劉大紳的說法,他雖然拒絕提供劉鶚原著二集的“真本”給傅幼圃,但是主動提供劉鶚生平資料作為傅幼圃寫作的參考。而這意謂傅幼圃必須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將原本可能已經完成的稿件進行大幅的更動。有意思的是,就在徐鶴齡與劉大紳會面後,百新在7月22日、23日《新聞報》的廣告中宣稱“承印敝公司之某書局忽有停辦之議”,再加上賣預售券一個月以來,“五千部之券遽然售罄”,讀者親自到公司抗議,“要求增加券額”,因此決定增加一千部預售券,售完就出書。¹⁸ 在1916年8月16日《千古未有之奇書〈老殘遊記〉下編今已出版》的銷售廣告中,百新宣稱“下編本定上月終儘出版,後為印刷局所誤,以致遲期半月”。¹⁹ 但是,事實更可能是,原本預訂七月底出版,結果劉家在七月上旬去找百新理論,逼得傅幼圃必須額外花費時間修改原稿,以至於拖延了出版的時間。讀者要求增加預售券額、印刷廠出錯延誤云云不過是藉口而已。從百新公司於1914年到1916年間在主流報紙上所刊登的廣告來看,百新公司與劉家的紛爭協商、傅幼圃對小說的寫作與修改、出版日程的決定以及銷售策略的擬定等等,無一不是環環相扣。

18 《老殘遊記上下編五千部特價券完績增乙千部緣起》,《新聞報》1916年7月22日第4版,7月23日第13版。

19 《千古未有之奇書〈老殘遊記〉下編今已出版》,《新聞報》1916年8月16日第1版,8月17日第1版,8月18日第2版;《時報》1916年8月19日第4版,8月20日第12版,8月21日第12版。

三、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與 《老殘遊記》二編的關係

根據劉大紳的說法，百新公司原本希望獲得劉家的《老殘遊記》二編的“真本”徑行出版，後來傅幼圃也要求劉家能夠提供二編“真本”參考以免行文唐突，但是都被劉大紳“以未得家人同意，不能獨許”為由拒絕。劉大紳這一理由本身其實相當可疑。根據劉蕙孫的說法，劉鶚的《老殘遊記》二集（即劉鶚於1907年於天津《日日新聞》發表的9回二編）的重新發現是在1928年。在那之前，劉家僅知道劉鶚寫有二集這一回事，但是發表在哪裏卻無法確定。1928年劉鶚的五子劉大經在整理天津《日日新聞》報館庫存時，發現二編九回的剪報本。劉大經讓劉大紳的兒女抄錄副本，至此九回本二編才重新面世。換句話說，在1928年之前，劉家僅知道有二編，但是手上並不擁有二編。²⁰ 所以，當1916年百新公司老闆徐鶴齡向劉大紳索取二編徑行刊印，以及編輯傅幼圃向劉大紳請求借閱劉家“真本”二編來參考時，劉大紳手上其實什麼都沒有。劉大紳所謂“以未得家人同意，不能獨許”只是託辭。

劉家在1916年時並不擁有《老殘遊記》二編，也因此劉大紳不可能將二編當中的內容透露給傅幼圃。但是，這不代表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就必然與劉鶚的九回本二編沒有關聯。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與《老殘遊記》二編不約而同地出現了老殘與友人同遊泰山的情節。儘管劉大紳指出，劉鶚游泰山斗姥宮與三教縱談等事蹟是自己向百新公司透露的，所以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中才會出現相關內容，²¹ 不過，獲悉劉鶚行止相關信息是一回事，但如何在眾多信息當中加以揀選，並且將之編織成爲小說敘述卻又是另一回事。我們可以發現，兩部小說儘管情節不同，但是在泰山之行的敘事結構與篇幅的安排上有相當程度的雷同。首先，《老殘遊記》二編中，老殘與友人詣泰山斗姥宮、聽得道修行者說法、觀日出、遊地獄景象等二編中的重要橋段，都可以在百新本

20 劉蕙孫：《我與〈老殘遊記·補編〉》（臺北：建安出版社，1997年），頁20。

21 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頁18。

《老殘遊記》下編中找到。其次,《老殘遊記》二編當中老殘遊泰山的故事是第1到第6回,而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中老殘遊泰山相關敘述是在第25章後半到31章後半,同樣也是六回。再者,我們還可以看到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在整體結構上與《老殘遊記》二編的對應處。《老殘遊記》二編9回寫的是老殘上泰山以及遊地獄,大約是一部二十回小說的前半。同樣地,二十回的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前半,也恰恰是關於遊泰山(包括了遊嵩里山的鄆都城)。最後,《老殘遊記》二編的最後是閻羅王請夜遊地獄的老殘返回陽間後向眾人傳遞訊息,而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結局則是老殘夜夢朝鮮始祖箕子,後者請老殘“傳語當軸”。從上述比較來看,兩部小說儘管情節差異甚多,但是在結構上的近似之處,卻又非單純的巧合可以解釋。

除了泰山故事的敘事結構之外,傅幼圃對於德慧生這個人物的處理方式,是另一個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與《老殘遊記》二編之間可能存在聯繫的線索。德慧生是小說初編一開始就出現的人物,是老殘的兩位至交好友之一(另一位是文章伯)。初編最後,老殘與妾環翠在齊河縣遇見了因東北局勢不穩而攜眷回江南的德慧生,因此計劃兩家同行。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便是從這裏開始續起。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對於德慧生這個人物的處理方式相當特殊。一般而言,傳統章回小說對於人物的介紹必然會交代其來歷。如果是擔任官職者,官銜職位的介紹必不會少。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中對於每一個人物的官銜與出身都有交代,但是偏偏就落下了小說一開始就出現的德慧生的官銜職位不提。更奇怪的是,既然是要寫老殘遊泰山,傅幼圃卻不沿著初編最後開啟的德慧生這條線,直接讓老殘跟著德慧生遊泰山——如同劉鶚在二編中所做的一樣。相反地,傅幼圃將德慧生擺一邊,另外創造出一個全新的角色祝清虛,讓老殘跟著祝清虛遊泰山。換句話說,德慧生被“虛寫”:身分被剝除、模糊化,並且把他從與老殘遊泰山的最合理的人選當中給拉下來。傅幼圃為什麼用這種方式處理德慧生這個人物?對傅幼圃而言,“虛寫”德慧生為什麼重要?

我認為,傅幼圃這樣的安排非常有可能說明了,他是在已取得天津《日日新聞》版本的《老殘遊記》二編,同時又不能承認他掌握了二編內容的狀況下,

進行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寫作。如此“虛寫”德慧生的目的，是爲了擺脫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寫作受惠於《老殘遊記》二編的嫌疑。

讓我們回到 1916 年 7 月百新公司與劉大紳之間那一場協商。根據劉大紳的描述，百新公司“作假”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過程中，在報紙廣告中暗示或公開宣稱覓得洪都百鍊生二編的“原本”。這讓劉大紳直接找上了百新公司質問。於是，百新公司老闆徐鶴齡拜訪劉大紳，請求劉家提供“真本”以便直接刊印，或者供傅幼圃寫作時的參考。但是，劉家拒絕了百新公司這一要求。過去，學者對於劉大紳這一描述的理解，是建立在“百新公司宣稱覓得‘原稿’的說法爲假”的假設之上。然而，就如同我們不能輕易從劉大紳以“未得家人同意，不能獨許”爲由拒絕提供“真本”來推論劉家擁有“真本”——實際上我也已經說明並非如此——我們也不能因爲百新公司向劉大紳要求提供“真本”就推論百新公司手上沒有《老殘遊記》二編的內容。作爲出版糾紛協商當中的一環，百新向劉家要求“真本”這一行動，不能單純地被認知爲“百新手中沒有真本，所以向劉家要求提供”。這一行動也很有可能是百新公司的交涉策略：百新公司手上實際握有《老殘遊記》二編部分或全部九回的內容，而之所以向劉家要求“真本”則是爲了讓傅幼圃依據二編爲基礎寫作續書可以名正言順。一旦劉家答應提供“真本”，那麼百新公司可以說是省力、省事並且能毫無顧忌地以原稿之名大賣其書。相對來說，如果協商的結果是劉家拒絕提供“真本”（如同實際所發生的），那麼手上握有《老殘遊記》二編的百新公司會面對什麼樣的情況呢？根據劉蕙孫的說法，劉家對於百新公司借“洪都百鍊生”名義作假下編一事非常憤怒，打算對百新公司提起訴訟官司。²²百新公司面對劉家的提告之議，自然必須放低姿態、息事寧人。因此，當劉家拒絕提供“真本”時，百新公司即便實際上握有 1907 年天津《日日新聞》出版的二編，按照常理也不可能透露給劉家知道，更不可能以二編當作底稿或參考來寫續書，以免進一步激

22 “一天聽家裏人說，有人偷印我祖父的《老殘遊記》，還做假書賣，不能答應他。過天，我大伯父劉著伯、二伯父劉辰仲和我父親，還有我母親的叔父羅子經先生，他的舅父我的大舅祖范緯君先生都來到我家，在我父母住的小客堂裏談這件事，商量和那些登報的人打官司，此事我印象很深。”劉蕙孫：《我與〈老殘遊記·補編〉》，頁 13—14。

怒劉家。一時之間，百新手上的《老殘遊記》二編就從一項寶貴的資產變成了一個避之惟恐不及的累贅。百新公司老闆徐鶴齡是在上海出版業打滾的生意人，如何能夠不明白這層道理？在這種狀況底下，傅幼圃自然必須盡量撇清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與《老殘遊記》二編之間的關係。要做到這樣，最乾脆爽利的方式，就是寫一個以全新的人物所構成的、與二編情節“全然無關”的全新故事，就如我們在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當中所看到的。

但是，這裏還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處理德慧生這個避不掉的人物。《老殘遊記》初編第二十回結束於老殘和送家眷回南方的德慧生的巧遇。換句話說，續書的開頭理當順著德慧生這條線開展出來。正如前述，按照章回小說慣例，小說在人物出場時，會對人物的官銜職位予以交代。劉鶚在初編二十回當中還未介紹德慧生的官銜職位，因此交代德慧生官職一事自然必須在續書一開始就處理。那麼，德慧生的官銜職位該怎麼寫呢？傅幼圃選擇了上述“虛寫”的方式來處理：略過德慧生的官職不提。這是一個相當聰明的處理方式。既然傅幼圃的策略是寫一個與二編“無關”的故事，那麼透過將德慧生的身分模糊化，既可以避免與二編的雷同所可能引起的抄襲原著的懷疑，同時也可以避免與二編對同一人物描述的明顯不一致所造成的對原著（以及劉家）的冒犯。相對來說，假設百新公司手上沒有《老殘遊記》二編，那麼其實傅幼圃根本不用擔心他的寫作會不會與二編有任何重疊之處，也因此不會在怎麼樣寫德慧生這個人物上有任何顧忌，也自然無需有任何刻意的經營。事實上，傅幼圃這樣的顧忌也反映在他對於與老殘同遊泰山的人選的處理上。按照常理，沿著初編最後開出的老殘與德慧生巧遇這條線，寫老殘與德慧生同遊泰山，才是順理成章的寫法。但是，傅幼圃偏偏反其道而行，將德慧生單獨發配回江南，改讓新的人物祝清虛出場，隨同老殘遊泰山。傅幼圃刻意避寫德慧生，正是與他將德慧生的身分模糊化出於同一敘述邏輯。小說對德慧生的古怪而刻意的處理，讓我們看到百新對於如何處理與二編之間的關係的顧慮。

上述關於百新公司擁有《老殘遊記》二編的說法，是基於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與二編在敘事結構上的雷同，以及傅幼圃不合常理的對於德慧生這個人物的“虛寫”。如果說這些證據多少還是屬於間接證據，那麼我們不妨再來

檢視另一條有意思的線索。小說初編一開始，除了寫到德慧生之外，還寫到了文章伯。在初編第一回，文章伯和德慧生兩人被描述為老殘的至交好友。這兩人一為文章，一為德慧，是一同出現的一對人物。因此，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一開始讓老殘、德慧生和文章伯以巧遇的方式一起出現，也算是呼應了原著的寫法。有意思的是，傅幼圃在小說中將文章伯寫成是在翰林院供職的京官。而對照劉鶚的《老殘遊記》二編，這一身分的擁有者不是別人，恰恰就是德慧生——二編一開始就提到德慧生是由翰林院朝考散館出去的京官。換句話說，《老殘遊記》二編當中屬於德慧生的翰林院出身，在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當中被給予了文章伯。傅幼圃大可以賦予文章伯任何的官銜職位，但是他卻偏偏選擇了《老殘遊記》二編中德慧生的出身翰林院的京官身分。這顯然並非巧合。正是因為文章伯與德慧生在《老殘遊記》中是一起出現的一對人物，所以在德慧生被“虛寫”之餘，原本屬於德慧生的身分很自然地就被傅幼圃拿來放在文章伯的身上。而傅幼圃之所以能夠這麼做，正是因為他早知道二編當中德慧生的身分。這一內部證據正足以說明傅幼圃很可能在寫作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之際已掌握了《老殘遊記》二編的內容。

過往學者在討論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寫作時，都是接受劉大紳的說法，亦即該書的情節安排受惠於劉大紳告知劉鶚生平事蹟。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說法並沒有錯。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中老殘游北京、入山西、開設紡織公司等情節無疑是劉大紳所告知。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影響傅幼圃寫作的因素並不止於此。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在各個不同層面上都透露出百新公司實際上掌握了《老殘遊記》二編的可能性——以及它的確受到二編影響的痕跡——雖然是以一種欲蓋彌彰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或許我們可以說，在民國初年首先發現《老殘遊記》九回本二編的人很可能不是劉家子弟，而是百新公司。百新公司廣告中“覓得原本”的說法，可能並非全然作假或全無根據。

四、廣告製造出來的預言書

關於百新公司如何透過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序以及小說內容營造出

“預言書”的形象，學者已經做了細緻的討論。²³除了序和小說內容之外，百新公司在讀者真正讀到小說之前，其實已經透過廣告將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預言書”的形象牢牢地根植於讀者的印象當中。

正如前述，劉家答應百新公司出版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條件，就是不使用“洪都百鍊生”的名義。但是，要讓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被認可為一部成功的預言書，首要的條件就是讓讀者接受它是劉鶚本人所作。所以百新公司不惜違反與劉氏後人的協議，而千方百計地將這部續書與原作者劉鶚聯繫在一塊。那麼，百新公司是如何在與劉家後人的協議的限制底下，將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塑造成為一部對於初版推出的 1916 年甚至是再版推出的 1920 年代的讀者來說精準的預言書呢？正如馮相郡所指出的，百新公司 1916 年 8 月初版下編版權頁以“前人”作為作者，一方面是遵守與劉家的約定，不使用洪都百鍊生之名，另一方面模糊的“前人”的字面意義也可以被解釋為“如前所述之人”（與上編版權頁所記“洪都百鍊生”同），誤導讀者相信上下兩編都是同一作者。實際上，即便是這種策略性的遵守也只是暫時的。在一些後來的重印版中，劉鶚（而不是“洪都百鍊生”或“前人”）明確地被指稱為上下兩編的唯一作者。²⁴然而，這個轉變並不是突然的，而是百新公司在十年之內逐步謹慎試探劉家底線的結果。1916 年 7 月初之後一直到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開賣的 8 月中，甚至 1917 年的再版銷售期間，我們可以發現百新在報紙上的廣告的確完全迴避提到洪都百鍊生或劉鶚的名字。但是，這個情形到了 1922 年開始改變了。從 1922 年 7 月開始到 1923 年 12 月底，百新在《申報》《新聞報》和《時事新報》上前後共 14 次刊登的廣告中，使用的都是“劉鐵筠”的名義。²⁵

23 Xiangjun Feng. “The Travels of Lao Can as a Book of Prophecy,” pp. 214 – 223.

24 Xiangjun Feng. “The Travels of Lao Can as a Book of Prophecy,” pp. 209 – 210.

25 《增加評注四十年真正的原本劉鐵筠先生著正續兩編五版出書〈老殘遊記〉預約出版了特價五百部》，《申報》1922 年 7 月 8 日第 18 版，1922 年 7 月 9 日第 19 版，1922 年 7 月 25 日第 19 版，1922 年 7 月 26 日第 21 版，1923 年 12 月 22 日第 5 版，1923 年 12 月 26 日第 8 版。《陽歷年假特價五百部真正原本四十回增評加注的劉鐵筠先生著老殘遊記正續兩編》，《新聞報》1922 年 7 月 15 日第 8 版，7 月 16 日第 18 版，7 月 19 日第 18 版，7 月 24 日第 18 版，7 月 26 日第 18 版；《時事新報（上海）》1923 年 12 月 16 日第 6 版，12 月 18 日第 6 版，12 月 24 日第 18 版。

1926年3月百新再版傅幼圃的《中國痛史》，²⁶在其書末廣告頁以全幅版面廣告百新本《老殘遊記》，特別要讀者“認明四十回兩巨冊的劉鐵筠先生著《老殘遊記》正續兩編”。²⁷從1922年開始的四年當中，百新在十幾次的廣告中都使用與“劉鐵雲”只有一字之差的“劉鐵筠”之名，有著明顯的誤導意圖。類似誤導性的操作到了1924年之後更是變本加厲。1924年5月，百新在上海《時事新報》刊登了四次廣告，直接稱上下兩編四十章的作者為“丹徒劉鐵雲先生”。²⁸到此為止，我們看到百新可說是正式把他們與劉家的協議徹底打破了。從1914年到1924年，百新公司試圖透過版權頁的模糊標示以及各種廣告噱頭來迴避與劉家的“不許用洪都百鍊生名義”的約定，並同時達到促銷百新本《老殘遊記》的目的。

在百新公司的成功銷售策略之下，百新本《老殘遊記》儼然成為了民國初年最具代表性、甚至是權威性的《老殘遊記》版本。這個情況一直持續到1925年。1925年12月，亞東圖書館出版了汪元放標點本的二十回《老殘遊記》，胡適（1891—1962）為之作序。在這篇序當中，胡適嚴厲地批評了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二十回是作偽的版本。²⁹以胡適的名望，這一嚴厲的批評想必對百新公司一直以來將劉鶚塑造為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作者的努力是一大打擊。就在亞東圖書館本出版的隔年10月，百新公司在《新聞報》上刊登了一則與過去相當不同的廣告：“從前祇有正集，出版以來轟動全國，雖情節未完，而人人爭購。現在續集出版，向作者哲嗣，再三商懇，允將續集歸本局獨家發行，從此首尾銜接，得窺全豹。”³⁰這則廣告並沒有承續過去策略，標榜該書為能夠預知未來的奇書，反而是訴諸其來源，暗示下編書稿是劉鶚家人提供。這當然是廣

26 此書原為傅幼圃寫於民國4年的《中國血淚記》，民國7年7月改名為《中國痛史》，由百新公司重新出版。民國15年3月的版本是“第十五次重印”。雖說是“重印”，但是其實是經過改版，增加了原本《中國血淚記》所沒有的七篇文章。

27 見傅幼圃：《中國痛史》（上海：百新書店，1926年）。

28 《照例再版書特價五百部注意四十回上下兩編的真確的劉氏原本增評加注劉鐵雲先生注老殘遊記正續兩編》，《時事新報（上海）》1924年5月18日第6版，5月19日第11版，5月22日第12版，5月26日第18版。

29 胡適：《〈老殘遊記〉序》，《老殘遊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5年），頁1—39。

30 《劉氏原本批注社會小說正續集老殘遊記》，《新聞報》1926年10月14日第17版。

告修辭：百新的確向劉家懇求允許發行，並且得到劉大紳的幫助完成了下編，但是廣告沒有說的是，劉家並沒有把下編的稿子（即所謂下編的“真本”）交給百新。百新與劉家交涉一事早在 1916 年就發生，但是到了 1926 年百新才首次將劉家允其“獨家發行”一說搬出來，顯然是對胡適的百新版本作假的批評做出的回擊與辯護。

除了將劉鶚塑造為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作者之外，百新公司同時還利用廣告與出版的時間差將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塑造為一部有著驚人準確性的預言書。正如學者已經指出的，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中所謂的“預言”只是傅幼圃寫作之際所發生的事件，但是被他包裝成早就被預測到並且寫進小說中的事件。這當然會引起讀者的質疑：如果這真的是預言，那麼為什麼不在事件發生之前就出版？百新對這一質疑有一個相當圓滑的說法。在 1916 年 5 月底刊登的廣告中，百新給出了這樣一個解釋：

《老殘遊記》……其上編二十章，天津《日日新聞》刊登印行。當時閱者皆以為無足輕重之言。迨至民國建立，其北拳南革之言，皎然大驗，有志之士遂莫不以一睹為快，故銷數達至十萬部之多。第不知下編二十章更於世事有關緊要。本公司覓得原稿於前年，早經登載《申》《新》《時》三報聲明出版，恐遭當局之忌，因此未敢遽印。兩年來承各商埠並外洋各島來函詢問，一時無可答復，深抱歉仄。今忽起忽滅之帝制，西南半壁之戰禍已成，種種事實已露，本公司亦不敢終秘。現已付印，儘六月告竣。先售特價五千部以答來函諸君之雅意。³¹

百新以“恐遭當局之忌，因此未敢遽印”的政治考量為理由來解釋這本“預言書”為何無法更早出版，而必須在“今忽起忽滅之帝制，西南半壁之戰禍已成，種種事實已露”（袁世凱稱帝失敗以及西南各省宣布獨立）之後才出版。這的

31 《〈老殘遊記〉下編特價券五千部廣告》，《時報》1916 年 5 月 31 日第 1 版，6 月 1 日第 1 版，6 月 3 日第 1 版；《新聞報》1916 年 7 月 11 日第 13 版；《申報》1916 年 5 月 25 日第 1 版。

確是相當聰明的策略與漂亮的藉口，畢竟任何有政治敏感度的“預言書”的持有者，都很可能會爲了明哲保身而暫時不發表。³² 除此之外，這則廣告中還有一個關於時間差的細節值得注意。1916年下編出書的廣告是在五月底刊出。廣告中宣稱下編“現已付印”，將在六月底出版。這一說法營造了一個書在五月底前已經完稿並已送印，不能再改動的印象。但是，事實上，如我們所知，下編根本沒有在五月底完稿送印。百新甚至在七月初還在與劉家協商，傅幼圃還在煩惱怎樣改動他的稿子，而且一直拖到八月中才出版。從五月底到實際出版的八月之中間所發生的重大事件，都還有機會可以插入小說當中，並且被當作這部號稱已於五月底前送印的書裏面的預言的實現。而事實上，傅幼圃的確也將同年六月袁世凱之死完美地安插入小說 31 回當中。換句話說，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是一部可以隨著出版時間的拖延，不斷添加“精準預言”的小說。

作爲一部“預言書”，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價值依賴於讀者是否將其內容“辨識”爲預言。宣稱該部預言書“恐遭當局之忌，因此未敢遽印”雖然不失爲高明的一著，但是這種說法仍然難免啟人疑竇。因此，百新公司同時採取了另一種廣告策略：逐漸加強暗示。1916年11月，百新公司首先在《新聞報》上刊登廣告：“下編預知吾國未來之結局。且內政外交之現象已隱隱發現。凡有家國思想者不可不讀。”³³ 這則廣告僅模糊地言及“內政外交之現象已隱隱發現”，但是到了1917年4月到5月之間，百新公司的廣告增加了更多細節：“至下編所演，率皆現在及未來之大事，中如八十三日皇帝夢、政界中變遷之怪劇及最近外交之變幻等情，均漸應驗。此外，明言暗伏之處，預測之端尚多。欲推知歐亞外交將來之結果者，不可不求諸此編。”³⁴ 從1916年廣告上的“隱隱發

32 關於這一手法，馮相郡有詳細的討論。見 Xiangjun Feng. “*The Travels of Lao Can as a Book of Prophecy*,” pp. 217 – 223.

33 《初版的、再版的上下編原本老殘遊記印出了，購券諸君快快來拿書》，《新聞報》1916年11月5日第4版，11月6日第8版，11月7日第13版，11月9日第7版，11月10日第13版，11月11日第7版，11月13日第7版，11月14日第13版，11月17日第4版，11月20日第7版，11月24日第14版。

34 《原本增批加注上下兩編老殘遊記三次再版》，《新聞報》1917年4月30日第4版，5月2日第13版，5月7日第13版，5月9日第13版。

現”到1917年的“均漸應驗”，從“外交之現象”到“歐亞外交將來之結果”，百新公司有意地往前推進，傳達給讀者一個清楚的訊息：書中預言的揭露不是過去式，而是進行式。

百新公司這一遞進暗示的廣告策略，在1922年之後開始變得更加大膽。1922年7月，百新除了原本的袁世凱皇帝夢之外，還一口氣在廣告中增加了不少當時發生的時事：“下編說的是袁世凱八十天的皇帝夢，張大辯十五天的復辟夢。什麼南征呀，什麼北伐呀，什麼二十一條呀，什麼兩個總統呀，什麼種種怪現狀，件件稀奇案，沒有不預先露佈。”³⁵這則廣告中增加了1917年的張勳(1854—1923)復辟、1917年開始的南北戰爭、1922年徐世昌(1855—1939)下臺後，復位的黎元洪(1864—1928)與當時任非常大總統的孫中山(1866—1925)形成“兩個總統”的情形。除了早在1915年發生的二十一條以外，其他的都是從1917年5月的廣告刊登之後到1922年7月新的廣告刊登之間發生的事件。隔年(1923)，百新的廣告在去年廣告的基礎上又添了一個“最高問題”(總統選舉問題)，³⁶1924年又再多出“武力統一的迷夢”(輿論批評各方軍閥試圖以武力統一中國)，³⁷這些都是分別在1923年以及1924年流行的政治語彙。可以說，百新公司以“逐年添加”時事的方式，將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塑造造成一部成功預言1916年袁世凱稱帝失敗和1924年軍閥混戰之間所發生的事件的預言書。當然，出版於1916年8月的小說中並沒有具體寫到或影射上述事件——畢竟，盡可能地模糊就是預言的本色。而書中看似正確預測了1917年7月張勳復辟的文字——“其間復有一般舊人，託復清名義起兵為亂”——其實更像是對於1916年3月袁世凱取消帝制之後宗社黨在日本支持

35 《增加評注四十四章真正的原本劉鐵筠先生著正續兩編五版出書〈老殘遊記〉預約出版了特價五百部》，《新聞報》1922年7月15日第18版，7月16日第18版，7月19日第18版，7月24日第18版，7月26日第18版。

36 《陽曆年假特價五百部真正原本四十回增評加注的劉鐵筠先生著老殘遊記正續兩編》，《時事新報(上海)》1923年12月16日第6版，12月18日第6版，12月24日第18版。

37 《照例再版書特價五百部注意四十回上下兩編的真確的劉氏原本增評加注劉鐵雲先生注老殘遊記正續兩編》，《時事新報(上海)》1924年5月18日第6版，5月19日第11版，5月22日第12版，5月26日第18版。

之下起事的描述。³⁸當然，我們可以說百新公司做了不實廣告。但是，更重要的是，隨著不同時間所下的廣告，百新公司不斷地引用最新的政治語彙和事件來“印證”寫於1916年的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引導讀者將時事“直接代入”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中模糊且模稜兩可的描述。換句話說，這些廣告的作用其實更在於暗示潛在的購書者在小說中自行“發掘”與“辨識”出與這些事件相關的預言。

五、預言、革命與亡國危機

將《老殘遊記》讀成預言書，並不是從百新公司在1916年出版百新本《老殘遊記》之後才開始的。劉大紳在《關於〈老殘遊記〉》一文中回憶他在民國初年的親身經歷，說明大眾讀者如何將《老殘遊記》讀成一部讖緯之書：

普通讀者中，十之八九有讖緯思想，以致離奇怪誕之言，百出不已。紳所親遇者：民國二年（1913）冬，紳由蘇州赴淮安，在南運河小輪中，同艙客有張姓者，閱《老殘遊記》，舉以相詢，問看過此書否。且語衆曰：“做此書人實在了不得，能知天下將大亂，在中國十八省中，各娶一妻生子置產，以備亂後傳嗣；本人曾經人介紹往訪，求為弟子不得”云云。又六年（一九一七）五月，紳由上海赴彰德，在平漢火車中，遇一于姓老人，同乘閑談。彼自謂：“學道峨眉，師一老僧名智元，今奉命下山立功；其同

38 小說第31章中“其間復有一般舊人，託復清名義起兵為亂”（第31回，頁5）的說法，被學者視為對於1917年張勳復辟的成功預言。然而，所謂“舊人”並不見得獨指張勳，而更可能是指小說寫作當時（1916年8月中以前）的宗社黨活動。1911年清宗室貴族組織宗社黨，反對共和制。雖然在宣統宣布遜位後解散，但是1914年在日本重新成立。1916年3月組成宗社黨勤王軍，並且結合蒙古獨立運動領袖巴布札布（1875—1916）的勢力在各地起事，一直到當年9月才正式解散。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冊1，頁252—54，257—258，260。而即便所謂“舊人”指的是張勳，那麼也不必然是對1917年張勳復辟的預言。事實上，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到同年8月中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出版之間，張勳不止一次表達支持恢復帝制。見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244，248，256。

學師兄弟老殘已下山多年,能知道過去未來,現正遊行各處,曾著有《老殘遊記》一書”云云。……此外即較有知識人,語荒謬詭怪,紀紕戾乖張者,亦頗不乏,特不如是之甚耳。³⁹

正如馮相郡指出的,這種種荒謬關於老殘的傳說,其實是關於老殘故事的大眾話語(popular discourse)的生產、傳播與變異的一環。⁴⁰而一個更早一些的例子則告訴我們,老殘故事作為一種大眾話語,其實一開始就與民間信仰以及政治認同密切相關。民國元年河南鞏縣一名叫做鍾媚川的讀者,將《老殘遊記》初編第8到11回摘要抄錄。在抄本最後,鍾媚川附上了兩則乩仙對信徒“問事”的回應,題為“中華民國元年大梁問國家時事”:

人心莫慌,天意自有主張。變革非常,氣數難強。不如安分過時光,還有後望。庚子晨,九月霜,朝野欣仰孔道彰,奚痛肝腸。曷觀我委心任運,無思無慮,諸事憑彼蒼,常慕首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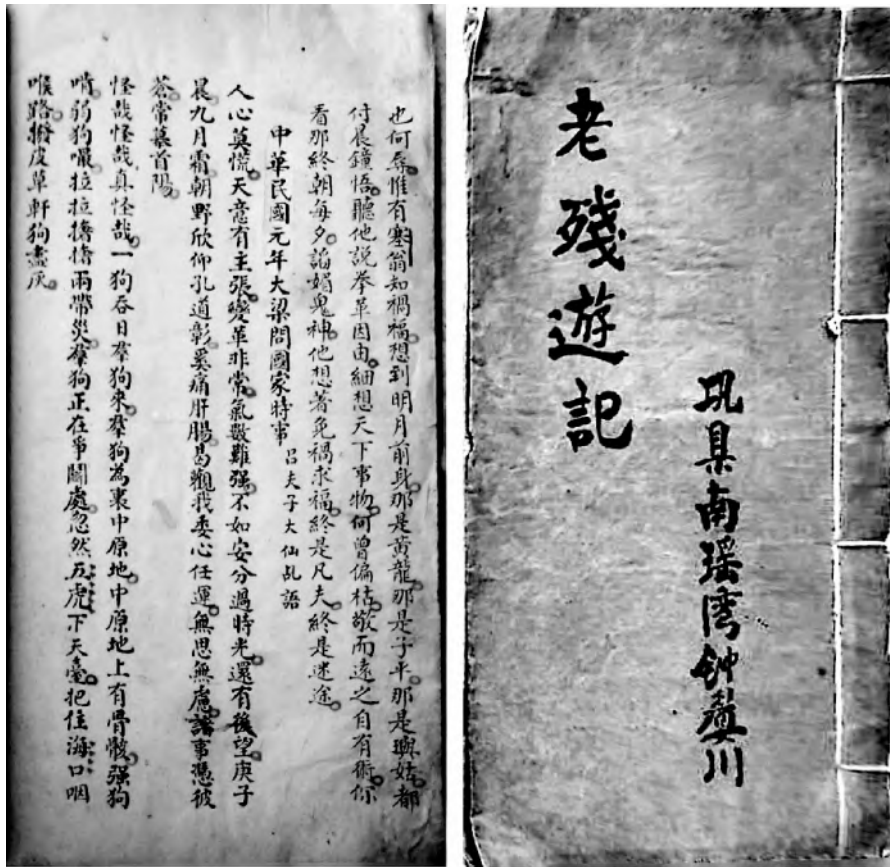
怪哉,怪哉,真怪哉!一狗吞日群狗來,群狗為裹中原地,中原地上有骨骸。強狗啃,弱狗噉,拉拉捨捨兩帶災。群狗正在爭鬪處,忽然五虎下天臺,把住海口咽喉路,撥皮草軒狗盡灰。⁴¹

從乩語前題“呂夫子大仙乩語”來看,這則乩語應是鍾媚川所錄的道家神仙呂洞賓降乩的乩語。這兩則乩語清楚說明,其訴求的受眾在政治立場上偏向同情宗社黨。宗社黨成立於1911年12月,是主張維護君主政體與皇族內閣的保守派政治團體,與立憲黨及革命黨鼎足而立。其核心成員為清皇室貴族,當中包括清末被譽為“滿清五虎”的良弼(1877—1912)、鐵良(1863—1938)以及載

39 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頁10,注3。

40 Xiangjun Feng. “The Travels of Lao Can as a Book of Prophecy,” pp. 216–217.

41 劉鶚:《老殘遊記》(鞏縣南瑤灣鍾媚川抄本),無頁碼。



澤(1868—1929)。⁴²這裏的第一則乩語安慰信眾“安分過時光，還有後望”，而第二則乩語以“群狗吞日”影射革命黨與立憲黨相爭，預告兩黨將被“五虎”(即宗社黨)剿滅。這兩則附在《老殘遊記》抄本最後的乩語反映出的是對於清宗室復興的想望。

這兩則乩語之所以會附在抄本最後，自然與《老殘遊記》第十一回講述的是革命黨的起落與清帝國復興的預言有關。第十一回中，申子平代替老殘往訪桃花山，途中遇見神秘女子瓊姑以及得道高人黃龍子，並且得其機緣聆聽黃龍子對於“北拳南革”(北方的義和拳以及南方的革命)的預言。黃龍子對革命的預言如下：

42 關於清末宗社黨的研究，見查時傑：《清末的宗社黨》，《臺大歷史學報》第5期（1978年6月），頁125—140。

南革之亂,起於戊戌,成於甲辰,至庚戌,辰戌一沖而爆發,然其興也漸進,其滅也潛消,南方之強也……所以釀劫運,亦皆所以開文明也。……南革之亂所以逼出甲寅之變法。甲寅之後,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滿漢之疑忌,盡皆消滅……故甲辰以後為文明芽滋之世。⁴³

當然,黃龍子所說的由未成之革命所激蕩出的“變法”,其實更近於立憲派而非保守派的政治圖景,但是乩仙顯然對此毫不在意,並且輕易地將《老殘遊記》轉化為以“五虎”為首的保守派的政治論述資源。《老殘遊記》儼然成為了媒合神仙降乩的民間信仰傳統與保守派政治論述的載體。

就如同保守派政治立場的讀者從《老殘遊記》當中找到清宗室復興的信心,革命黨的支持者也試圖從風行一時的《老殘遊記》當中尋求革命終將成功的論述資源。從作品的政治立場來看,《老殘遊記》按理說不是會受到革命支持者青睞的小說。錢玄同(1887—1939)就曾經在報上公開批評《老殘遊記》對於革命的負面看法是“老新黨頭腦不甚清晰之見解”。⁴⁴即便胡適對於《老殘遊記》推崇有加,但是對於錢玄同這一批評也不得不買單。⁴⁵但是,令人訝異的是,儘管《老殘遊記》在預言中對革命抱持負面態度,但是它卻同樣因為預言的準確性而受到革命黨支持者的歡迎。正如1930年代初期一位署名蕭山天放的作者所見,《老殘遊記》預言革命在庚戌年(1910)爆發,比實際發生時間辛亥(1911)只早了一年,因此“到了辛亥推翻滿清,革命黨人對於《老殘遊記》這部小說,反是十分崇拜,竟把老殘這個人當作預言家,幾乎人手一編,忙得上海書鋪三版四版以至十二版的暢銷《老殘遊記》”。⁴⁶這位作者接著批評,老殘(劉鶚)“對革命黨人罵的這等挖苦……那知道老殘還是個反革命呢!”⁴⁷正因為這

43 劉鶚原著、徐少知新注：《老殘遊記新注》（臺北：里仁書局，2013年），頁199。

44 錢玄同：《錢玄同文選》（成都：四川文藝書版社，2010年），頁6。

45 胡適：《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冊1，頁130；冊2，頁1042。

46 天放：《三十年回顧（十）》，《第一回 石破天驚預言談革命，雲開月初片語判終身》，《漢口中西報》1932年4月27日第10版。

47 同上。

一矛盾，革命黨支持者將《老殘遊記》納入其政治論述的方式較宗社黨來得迂迴。例如，蕭山天放在小說《三十年回顧》當中，就以虛構的筆法描寫劉鶚寫作《老殘遊記》的背景，藉以顛覆《老殘遊記》中對於革命的負面看法，並重新創造了一則革命終將成功的預言。小說中描述劉鶚原來是從黃龔子（暗指太谷學派第三代領袖黃葆年（1845—1924））處聽聞北拳南革的預言。劉鶚原本對此預言不屑一顧，但是到了庚子拳亂之後對此改觀，並且將黃龔子的預言寫入小說第十一回，成為了黃龍子的預言。然而，劉鶚在將預言寫入小說的過程中，對預言做了惡意的變造。原本黃龔子對於革命的預言是“南方革命之出現……其興也漸進，其成也迅速，此南方之強也，上自將相，下至士夫，亦莫不信從，其主義為改善創造，所以開文明也”，⁴⁸但是劉鶚在小說中卻將這一正確的預言加以變造，成了後來讀者在《老殘遊記》中所看到的，“南革之亂……其興也漸進，其滅也潛消，南方之強也。其信從者，下自士大夫，上亦至將相而止，主義為逐滿”。⁴⁹表面上看，《三十年回顧》對於劉鶚寫作《老殘遊記》過程的虛構性描述是對《老殘遊記》的否定，但實際上卻是藉由重新建構《老殘遊記》的書寫過程創造出一個關於革命終將成功的預言。

從辛亥革命到 1930 年代，《老殘遊記》被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詮釋，為炮製革命注定成功的預言做出貢獻。出版於 1916 年的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正是這一趨勢當中的一環。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第 30、31 章寫老殘在泰山上遇得道高僧普慧禪師，後者對於清帝國即將失去天下做出預言。普慧首先指出清帝國天下難保“不能盡怨朝廷用人不當，也是劫數使然”，繼而說明“如今清朝的國運如日月之已西，海潮之將落。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使西者復東，使落者再漲矣”。⁵⁰ 普慧接著演說“北拳南革”的結果與世界的變遷之勢。“北拳南革”的預言原是二十世紀初的《老殘遊記》讀者最熟悉的部分。普惠論及“北拳”（義和拳）的浩劫較《老殘遊記》初編中黃龍子所論遠為詳細，並且充滿

48 天放：《三十年回顧（八）》，《第一回 石破天驚預言談革命，雲開月初片語判終身》，《漢口中西報》1932 年 4 月 27 日第 10 版；天放：《三十年回顧（九）》，《第一回 石破天驚預言談革命，雲開月初片語判終身》，《漢口中西報》1932 年 4 月 27 日第 10 版。

49 劉鶚原著，徐少知新注：《老殘遊記新注》，頁 199。

50 傅幼圃：《老殘遊記》下編，第 30 章，頁 7—8。

不同的細節。但是,在論及“南革”時,普惠顯然是有意呼應《老殘遊記》中黃龍子的預言。普惠的預言云:“南方的一般志士英雄……傷種族之淪亡,歸罪朝廷,發起一種湯武革命的義憤,專以排滿保種族為宗旨。一唱百和,舉國騷然。將相士庶,無不嚮應。其發也漸,其成也速,而清社亡矣!”⁵¹ 普惠預言的表達方式甚至句法,可以說是處處模仿黃龍子的預言。傅幼圃之所以再提“北拳南革”,之所以刻意重複對於“南革”預言的表達形式,並非缺乏創意。相反地,這是一種我稱之為文本覆蓋的寫作策略的運用。《老殘遊記》初編中黃龍子關於革命的預言就在那裏,傅幼圃無法刪去。他可以做的,是在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當中讓老殘親自登山,讓革命預言的講述“重來一次”,藉由相仿的表達句式,讓普惠的版本將黃龍子失敗的預言覆蓋掉。

傅幼圃重寫黃龍子關於革命的預言,並不只是提供了另一版本的預言。相反地,傅幼圃“直搗黃龍”,從顛覆黃龍子預言的根據——對於《易經》革卦的解釋——入手。在聽聞了普惠關於革命的預言後,老殘興高采烈地道:

據禪師這等講,想必是革命成功,實行革故鼎新之政,學那法美諸國,舉總統的制度,一變而成民主國了。若能如此,倒是革去了數千年專制的積習,民氣為之一伸……既有這般英雄志士造成民主新國,人人得平權自由,即人人知愛群維國,眾志成城,庶幾可以日見太平,而免瓜分之禍。⁵²

對於老殘天真的期待,普惠解釋革命並沒有這麼簡單,並且以《易經》中的“革卦”來說明革命的性質。普惠講“革卦”顯然又是對於黃龍子的指涉。在《老殘遊記》初編中,黃龍子從“革卦”開始,將革命解釋為洪水猛獸,並且以“革卦”的彖辭“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來描述革命黨的自私自利。在百新本《老殘遊記》當中,普惠將黃龍子對“革卦”的解釋,徹頭徹尾地改造了一番:“變革之事極重,進取急則先後易舛,權獨任則謗讟易興,且有慮不周到,計不便民,豈有一革即定之理嗎? 即如拿破崙革命成功,又思大權獨攬,民心不服。這就是“革

51 傅幼圃:《老殘遊記》下編,第31章,頁3。

52 同上,頁4。

卦”象辭，‘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之義，所以致成一革再革，直至十革而始定”。⁵³這裏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傅幼圃是如何透過普慧的“革卦”以及《象辭》的解釋，試圖讓讀者接受一套不同於黃龍子的對於革命的全新說法。換句話說，傅幼圃藉由重寫覆蓋了黃龍子的預言，將劉鶚對於革命的負面說法取消掉。這也說明了為什麼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沒有一字一句提及對當時《老殘遊記》初編讀者而言最重要的黃龍子。傅幼圃在 1916 年袁世凱稱帝失敗之際，透過重寫黃龍子的預言，將“反革命”的黃龍子從小說中抹除，不能不說是一個相當政治正確的表態。

1916 年袁世凱稱帝失敗、中國重歸共和固然是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寫作的主要政治背景之一，但是並非全部。對於傅幼圃而言，另一個他想要藉百新本《老殘遊記》中的預言表達的重點，其實是小說出版當下中國所面對的被瓜分甚至亡國的危機。這一危機感的直接源頭是小說出版前一年（1915）5 月 9 日中國被迫與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一事。1915 年 5 月 9 日之後，傅幼圃隨即寫作了《中國血淚記》，詳細陳述清帝國自與外國展開外交關係以來到當前的“五九國恥”所遭遇的各種不平等待遇，批評清帝國與共和國政府顛預的應對方式，並且試圖指出可能的救國之道。⁵⁴傅幼圃在隔年所作的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雖然是應百新公司的商業出版需求而作，但卻也是傅幼圃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之作：百新本《老殘遊記》當中諸多對於晚清中國處境的批判與思考，都是出自傅幼圃自己寫於“五九國恥”之際的《中國血淚記》。例如，小說第 24 章中以七品京官致仕的旅館主人葉老對於李鴻章的批評，與《中國血淚記》中描述清法戰爭過程的文字相一致。⁵⁵第 38 章老殘的好友巨賈管振華“振興國貨”的主張，不僅與傅幼圃在《中國血淚記》中救國之道的看法相同，兩者文字

53 傅幼圃：《老殘遊記》下編，第 31 章，頁 4。

54 傅幼圃：《中國血淚記》（上海：掃葉山房，1915 年）。

55 （葉老道）：“後來因法軍攻陷北寧，朝廷命李鴻章與法國議和。鴻章舉安南全國讓與法人，並准法人在雲南、廣西諸省自由行動。一時輿論大譁，朝臣交相劾李鴻章。老漢亦聯絡同志，上疏條陳得失，請毀草約。”傅幼圃：《老殘遊記》下編，第 24 章，頁 2。“法軍陷我北寧太原諒山諸地……遂命李鴻章出任和局……並准其於雲南廣西諸省通商。是不僅舉安南割讓與法國，且大碍主權。一時輿論大譁，言官交章劾鴻章。”《中法戰爭割讓安南之始末》，傅幼圃：《中國血淚記》，頁 47—48。

更是幾乎相同。⁵⁶我們可以說,《中國血淚記》為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政治批評提供了重要的資源。

《中國血淚記》與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之間最緊密的關係,在於兩者共享了關於朝鮮亡國的描述。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關於朝鮮亡國史的著述十分盛行。根據學者的粗略估計,從 1911 年到 1940 年,包括 1910 年雞林冷血生的小說《英雄淚》以及多次論及朝鮮之亡的《中國血淚記》在內的相關著作,⁵⁷至少就有二十幾種。這些作品的作者或編者主要是有留日背景的政治人物以及活躍於上海的小說家。⁵⁸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書籍的出版以 1915 年 5 月 9 日前後最為蓬勃。出版於 1916 年的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最末寫老殘由日本回國途中繞道朝鮮,藉機考察日本統治朝鮮的現狀,目睹朝鮮在日本統治下的慘況,也是這一波朝鮮亡國書寫的一部分。⁵⁹

更具體地說,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最後兩回對於老殘遊朝鮮的描述,是《中國血淚記》中的朝鮮亡國論述的直接體現。劉鶚曾經遊歷朝鮮固然為事實,但是傅幼圃以老殘遊朝鮮結束這部小說,卻是明顯對於《中國血淚記》中朝鮮亡國論述的呼應。在《中國血淚記》最後一章《痛定思痛之結論》的最後,傅

56 例如,在《中國血淚記》的《提倡國貨為救亡之要著》一文中,傅幼圃強調國人“咸以提倡國貨,杜塞漏卮為念”(頁 146)、“雖無識婦孺,亦皆知改用國貨為挽回利權之旨”(頁 146)、“如此努力進行,則國貨之振興勃然,而外溢之漏卮閉塞,庶乎國家之弱疾可瘳矣”。(頁 146)而《老殘遊記》下編對於商人管振華的描述使用了極為相似的詞語:“管振華隱於商。他雖則廢然歸隱,而愛國之心,猶不去懷。年來以生意發達,便想出一個振興實業挽回利權的法子。”傅幼圃:《老殘遊記》下編,第 38 章,頁 2。“這個生意是為愛國開化之舉,必須辦理發達,我國之人纔能信服振興實業,可以抵制洋貨、杜塞漏卮,從此不再利權外溢。”同上,頁 5。在 38 章的回末評語中,傅幼圃又再次強調本章“寫管振華心存愛國,振興實業,集股開辦紡織公司,仿外洋的辦法,改良國貨,以挽利權”。同上,頁 11。

57 對於“雞林冷血生”的身分有兩種說法。一是著名報人陳景韓(1878—1965),一是吉林省在校學生或者教職員。關於第一種說法,學者已經論證其不能成立,但是真實身份仍難考定。見牛林傑、劉惠瑩:《論近代珍本小說〈英雄淚〉及其藝術特色》,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主編:《韓國研究二十年(文化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頁 165—167。

58 徐丹:《清末民國時期的“朝鮮亡國史”著述》,《近代史研究》2020 年第 1 期,頁 133—139。

59 事實上,小說第 40 回當中老殘在朝鮮所聽聞的關於日人在朝鮮所作所為的描述,基本上就是擷取自 1910 年雞林冷血生《英雄淚》第 19 回到 20 回當中的內容。

幼圃對讀者大聲疾呼“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生爲華民，死爲雄鬼。幸勿瞻徇觀望，作亡國之奴，爲波蘭、猶太、朝鮮諸國斬絕血食之餒鬼，擲掄於地下也”。⁶⁰傅幼圃在書末的這一心痛的呼籲，在隔年出版的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最後一章當中被以敘述化的方式表現出來。老殘見到朝鮮的慘狀，心下對於古朝鮮開國君主箕子的國家被滅、三千餘年受祀的血食被斬感慨尤深。當晚老殘就在夢中覲見箕子，承其喻示：

日本之興亦運會使然，俾其擴充土地，雄起於亞東以與歐美成鼎足之勢。支撐環球新局耳。寡人血食，行將斬絕。然繼寡人之後者，恐亦不免。中國爲寡人祖國，將有變更之禍。寡人種族相關，未能忘情，故邀先生略示朕兆，回國傳語當軸，唇亡則齒寒，不可不慎。（40 章頁 2）

小說將《痛定思痛之結論》中爲“斬決血食之餒鬼，擲掄於地下”的感慨，實實在在轉化爲老殘於夢中所經歷的場景。傅幼圃猶恐這樣講還不夠清楚，因此在小說第 40 章的回末評語中再次強調：“享血食三千餘年，爲亘古未有之綿長。固雖絕其祭祀，亦不足關心。惟有四五千年之祖國，以種族之故，實未能忘情，不得不示之朕兆，俾知警戒，或可以上格天心，以弭禍耳。”（40 章頁 12）我們可以看見，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不僅納入了傅幼圃在《中國血淚記》當中的見解以及語言表達，而且小說的收束甚至是從《中國血淚記》最後一篇文章的最後一句話發展而來。傅幼圃可以說是透過寫作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將《中國血淚記》中民國初年國家存亡危機的大敘事，以清末的老殘的角度重新講述出來。

從民國建立開始，《老殘遊記》中黃龍子的預言成了不同政治立場的讀者與作者汲取政治論述資源的所在。出版於袁世凱稱帝失敗後的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將黃龍子的預言以類似的形式，但全然不同的立場重新講述一次，藉以將《老殘遊記》中已失敗（且政治不正確）的預言覆蓋掉。除了將老殘的故

60 傅幼圃：《中國血淚記》，頁 150。

事賦予政治正確的意涵之外，傅幼圃在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中，也是藉晚清以來流行的朝鮮亡國的主題表達中國面臨亡國危機。出版於1916年的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可以說是恰當地捕捉到當時知識分子對於劇烈變動的政體以及嚴峻對外情勢的憂慮心態。

六、結 語

本研究確定了過去懸而未決的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的作者身分，同時也對劉鶚的《老殘遊記》二編與百新本下編之間的關係提出了全新的解釋。更重要的是，本文藉由對與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相關的廣告宣傳、交涉、製作、出版到後續銷售的連續鏈條的分析，揭示了民國初年文學、商業、政治與文化之間的微妙互動。

本文指出，百新公司將《老殘遊記》下編炮製成“預言書”並不只是依賴出版於1916年8月的小說的序言及其內容。相反地，百新公司在小說出版前後的長時間、持續性的報紙廣告投放，除了是出於促進銷售的目的，同時也是以巧妙的暗示性手法，影響潛在的讀者對於《老殘遊記》下編的解讀方式。百新公司無疑是爲了商業利益而創造出百新本《老殘遊記》下編這部空前成功的“偽書”。然而，這部“偽書”的製作與出版卻絕非純然出於商業考量。藉由對於百新本《老殘遊記》報紙廣告的分析，我們看到百新公司巧妙地將商業利益、政治敏感度以及當時社會對預言及神秘主題的渴望融合在一個緊密的出版實踐中。特別是，百新公司的商業操作，揭示了民國初期的商業出版如何重新利用與共和國政治意識形態相左的晚清文學作品，並且將其轉化爲供給共和國國家建設和危機動員的重要資源。

過去研究已經指出，由胡適作序的1925年亞東圖書館《老殘遊記》出版之前，百新本上下二編才是最受歡迎的《老殘遊記》版本。而胡適對於劉鶚《老殘遊記》初編的揄揚以及對於作爲“預言書”的百新本下編宣傳手法的嚴厲批評，也被學者認爲是百新本在民國初年退流行，以及劉鶚的《老殘遊記》初編得以堂而皇之地進入共和國國家文學名單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正如本文指

出的，《老殘遊記》之所以從一部在政治意識形態上與共和國價值矛盾的作品，轉變成為共和國意識形態服務的作品，恰恰是百新公司的傑作。換句話說，正是胡適公開批評的百新公司的商業策略，無意中為《老殘遊記》提升到民國的國家文學的經典地位奠定了基礎。在這個意義上，本文通過揭示這一深具反諷性轉折，為現代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源提出了與過去不同的觀察。

（作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引用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 胡適：《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胡適：《老殘遊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5年。
- 徐迺翔：《中國現代文學辭典(小說卷)》。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
- 傅幼圃：《中國血淚記》。上海：掃葉山房，1915年。
- 傅幼圃：《中國痛史》。上海：百新書店，1926年。
- 劉鶚著，傅幼圃批注：《甲種批注老殘遊記上編》。上海：百新書店，1916年。
- 傅幼圃：《老殘遊記》下編。上海：百新書店，1916年。
- 劉蕙孫：《我與〈老殘遊記·補編〉》。臺北：建安出版社，1997年。
- 劉鶚：《老殘遊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5年。
- 劉鶚：《老殘遊記》。鞏縣南瑤灣鍾媚川抄本。
- 劉鶚原著，徐少知新注：《老殘遊記新注》。臺北：里仁書局，2013年。
- 鄭逸梅：《藝林舊事》。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6年。
- 錢玄同：《錢玄同文選》。成都：四川文藝書版社，2010年。
- 寶璐：《色情之男女補編》。上海：百新書店，1933年。

(二) 論文

- 牛林傑、劉惠瑩：《論近代珍本小說〈英雄淚〉及其藝術特色》，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主編：《韓國研究二十年(文化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頁165—167。
- 查時傑：《清末的宗社黨》，《臺大歷史學報》第5期(1978年6月)，頁125—140。
- 徐丹：《清末民國時期的“朝鮮亡國史”著述》，《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頁133—139。
- 張永芳：《近代小說〈慨生游志〉係〈老殘遊記〉的仿作》，《清末小說から》第96期(2010年1月)，頁18—20。
- 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文苑》1939年第1期，頁18—19。

劉蕙孫：《〈老殘遊記〉出版九十週年》，《南京理工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2期，頁64—65。

（三）報刊

《〈老殘遊記〉下編特價券五千部廣告》，《申報》1916年5月25日第1版。

《〈老殘遊記〉下編特價券五千部廣告》，《時報》1916年5月31日第1版，6月1日第1版，6月3日第1版。

《〈老殘遊記〉下編特價券五千部廣告》，《新聞報》1916年7月11日第13版。

《千古未有之奇書〈老殘遊記〉下編今已出版》，《時報》1916年8月19日第4版，8月20日第12版，8月21日第12版。

《千古未有之奇書〈老殘遊記〉下編今已出版》，《新聞報》1916年8月16日第1版，8月17日第1版，8月18日第2版。

《百新公司百新新話》，《時報》1914年11月30日第4版，12月1日第4版，12月2日第9版。

《老殘遊記上下編五千部特價券完續增乙千部緣起》，《新聞報》1916年7月22日第4版，7月23日第13版。

《初版的、再版的上下編原本老殘遊記印出了，購券諸君快快來拿書》，《新聞報》1916年11月5日第4版，11月6日第8版，11月7日第13版，11月9日第7版，11月10日第13版，11月11日第7版，11月13日第7版，11月14日第13版，11月17日第4版，11月20日第7版，11月24日第14版。

《看出版之預告：百新公司百新新話》，《時報》第4版，1914年11月30日。

《原本增批加注上下兩編老殘遊記三次再版》，《新聞報》1917年4月30日第4版，5月2日第13版，5月7日第13版，5月9日第13版。

《陽歷年假特價五百部真正原本四十回增評加注的劉鉄筠先生著老殘遊記正續兩編》，《時事新報（上海）》1923年12月16日第6版，12月18日第6版，12月24日第18版。

《陽歷年假特價五百部真正原本四十回增評加注的劉鉄筠先生著老殘遊記正續兩編》，《新聞報》1922年7月15日第8版，7月16日第18版，7月19日第18版，7月24日第18版，7月26日第18版。

《照例再版書特價五百部注意四十回上下兩編的真確的劉氏原本增評加注劉鐵雲先生注老殘遊記正續兩編》，《時事新報（上海）》1924年5月18日第6版，5月19日第11版，5月22日第12版，5月26日第18版。

《劉氏原本批注社會小說正續集老殘遊記》，《新聞報》1926年10月14日第17版。

《增加評注四十章真正的原本劉鉄筠先生著正續兩編五版出書〈老殘遊記〉預約出版了特價五

- 百部》,《申報》1922年7月8日第18版,1922年7月9日第19版,1922年7月25日第19版,1922年7月26日第21版,1923年12月22日第5版,1923年12月26日第8版。
- 《增加評注四十章真正的原本劉鐵筠先生著正續兩編五版出書〈老殘遊記〉預約出版了特價五百部》,《新聞報》1922年7月15日第18版,7月16日第18版,7月19日第18版,7月24日第18版,7月26日第18版。
- 天放:《三十年回顧(八)》,《第一回 石破天驚預言談革命,雲開月初片語判終身》,《漢口中西報》1932年4月27日第10版。
- 天放:《三十年回顧(九)》,《第一回 石破天驚預言談革命,雲開月初片語判終身》,《漢口中西報》1932年4月27日第10版。
- 天放:《三十年回顧(十)》,《第一回 石破天驚預言談革命,雲開月初片語判終身》,《漢口中西報》1932年4月27日第10版。

二、外文

- 神田一三:《劉家公認の贗作“老殘遊記”》,《清末小説から》第137期(2020年4月),頁12。
- Xiangjun Feng. “The Travels of Lao Can as a Book of Prophec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3.1 (2023): pp.203 – 228.

**How a Forged Sequel Came into Being:
The Making of the Baixin Edition of the Sequel
to *The Travels of Lao Can*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Hui-Lin Hs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its serialization in newspapers in 1906, Liu E's (1857 – 1909) 20-chapter novel, *The Travels of Lao Can*, elici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Its prominence motivated multiple publishers to reprint the novel, and it also inspired the creation of several sequels. In 1916, the Shanghai Baixin Company released a detailed annotated edition of *The Travels of Lao Can* in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comprised Liu E's original 20 chapters, while the second introduced a sequel authored by the Baixin Company but falsely attributed to Liu E. Recent scholars are increasingly aware of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Baixin edition in popularizing *The Travels of Lao Can* throughout the initial years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present paper uses the Baixin Company's publishing endeavor as a case study to deline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ercial publishing dynam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that predominantly focus on the book's preface and main conten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Baixin Company's promotional strategies and sales advertisements. It explores how the Baixin Company leveraged marketing and contemporaneous events to endow the novel with a "prophetic" persona. In its editorial and publishing endeavors for the sequel, the Baixin

Company adeptly amalgamated commercial pursuits, political inclinations, nationalist emotions, and a fascination for the esoteric.

Keywords: *The Travels of Lao Can*; the Baixin Company; sequel; advertisement; prophecy